

陈寅恪书信里的大师风度

日记、书信通常属于私人写作范畴,故可窥见作者的真性情。就文化大师陈寅恪而言,他似乎没有日记,至少现在还没有发现,书信就成为诗词之外窥见其思想情感的绝佳材料。

治学严于律己

陈寅恪书信多以谈论学术为主,最著名者是那封《与妹书》,其次可能就是《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》。前者因被好友吴宓称为“寥寥数百字,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,识解之高而远”,早已蜚声学林。

后者则与当年一件公案有关。陈寅恪在1932年为清华入学考试出国文试题时,有“对对子”这一传统考试题型,其中如“孙行者”答案为“胡适之”等,更是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。为申明自己的出题用意,陈寅恪遂写信给清华国文系主任刘文典(字叔雅),后该信连同记者采访一同发表,才算暂时平息了人们的议论。由此信引发的汉语语法与印欧语系异同问题,其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,至今值得学术界重视。

虽为著名学者,陈寅恪从未在友人和弟子面前表现出学识渊博、高人一等的自负。相反,其书信中常见“寅于此范围一无所知,病中匆读一过,信笔写其印象而已”“寅于西南民族语言无所通解,承询各节愧无以对,甚歉甚歉”等字样,更有多次为自己论文中出现失误,向其他学者道歉的文字。

仅就现有书信看,他曾两次写信给陈垣(教育家、史学家),说自己某篇文章中出现错误,也曾为此写信给胡

适,请胡适千万不要发表,以免误人子弟,其语气之谦恭,态度之诚恳,令人肃然起敬。

为维持生计与他人讨价还价

现存陈寅恪书信中,有一部分内容谈论生活琐屑,如个人收入、家庭困难及为弟子介绍发表文章和谋求工作等。可见,长期处于社会动荡和战乱之中,即便是陈寅恪这样的著名学者,也要为让自己和家人弟子有口饭吃而疲于奔命。

诸如“请速汇款”“请支付评审费”等字样不时出现于陈氏书信中,令人为之叹息。也不乏大发牢骚,或直接向诗寄托情怀的文字,于讥讽时事之余,字里行间仍袒露他因生活动荡、难以安心治学的担忧。

陈氏现有书信中,当以写给老友傅斯年的数量最多,其中有这样一段话,很是引人瞩目:“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,非是既富且乐,不能作诗……古人谓诗穷而后工,此精神胜过物质之说,弟有志而未逮也。”

在写给傅斯年的另一信中,陈寅恪再次重复这一说法:“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,徒欺人耳。”

陈寅恪和傅斯年既是多年老友,又有姻亲关系。抗战期间,两人虽因陈寅恪为养家糊口兼职授课之事有过不快,但并未真正影响他们的友谊。

其实,上述书信中陈寅恪反对古人“诗穷而后工”之说,就是在向傅斯年表示,他不是为赚钱而赚钱,而是要为从事学术研究准备一个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环境。此外,陈寅恪不止一次在写

给傅斯年的信中为经济困难大发牢骚,也说明他并未把傅斯年当作大学里的上司,而是可以托付和信任的好友。

也因此,在陈寅恪写给傅斯年的信中,有时可见他为了多挣点钱和他人讨价还价的细节,以至到了“斤斤计较”的程度。那时,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想请陈寅恪写篇文章,开价是千字三百元法币,已经较常规翻倍,但陈寅恪提出要每篇一万元法币,后因双方分歧过大,遂作罢。还有一次,陈寅恪告诉傅斯年说,四川大学请他演讲,因“四川大学之贱买”,陈寅恪开出了万元法币一次的高价,“因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,须准备稿子,仍与作文无异也”。

陈寅恪如此索要高价稿费和演讲费,似乎和人们心目中读书人的“清高”形象不符。其实,陈寅恪等文人学者彼时正处于颠沛流离之中,唯一能维持生计的就是撰文研究。于乱世中坚持学术、靠学术谋生,自然堂堂正正。

亦见安适风趣

当然,陈寅恪的书信中也不全是抱怨和牢骚,有时也会显现其幽默风趣的一面。

1943年,战火逼近湖南长沙,迫于形势,本在桂林广西大学任教的陈寅恪不得不携家人经贵州入川,先在重庆小住,年底至成都担任燕京大学教授,直至抗战胜利。虽然彼时物价飞涨,但不必担心颠沛流离,陈寅恪的身心算是暂时安定。

燕京校方对陈寅恪来校任教十分重视。当时,一般教授薪资最高为360元,而给陈寅恪的则高达450元,以示崇敬。陈家初到时,学校安排多位教师看望,并协助布置家具、安排生活日常等。后又请他们一家搬到华西大学文学院的宿舍,因燕京学生彼时也在华西大学上课,陈寅恪到教室极为方便。

这一时期的陈寅恪书信,难得出现了较有平常生活气息的文字。例如,他写给萧公权先生的一封信,主旨是向对方讨要一只猫来

养。萧公权1920年自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,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,先后在南开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任教,抗战爆发后任教于四川大学、成都燕京大学等,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四川任教。1948年,他和陈寅恪同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。

估计就是在陈寅恪迁居华西大学宿舍后不久,萧公权送给陈家一只小猫,深得陈家人喜爱。后小猫被偷走,陈夫人乃至寝食难安,陈寅恪即写信给萧公权,请求再次得到帮助,甚至表示可以出高价购买:“前承惠赠小猫,家人爱玩之,甚于以前所蓄养者,昨日午后忽被人窃去,举家惋惜,而内子尤甚,至于废寝忘餐。不知尊处尚有猫儿可以暂时见借否?如某有则请愿顶一头矣,将来备礼、奉聘,尝蒙赐允,不胜感幸之至。”

这一时期陈寅恪心情较佳,还可由他1944年10月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看出。此前他写给傅斯年的信大都是抱怨战乱之苦和生活艰辛,而这封信没有谈及经济事务,倒是关心傅斯年的西北延安之行。

傅斯年等人赴延安,系当时国民参政会之决议,他们以参议员身份考察延安,实际带有在国共两党间联络之意,寻求抗战后两党和谈的机会。陈寅恪在信中向傅斯年索要新出的几种中国史书籍,如果他没有,即委托他向林伯渠、范文澜等人求取。接下来,陈寅恪罕见地幽默了一回,半开玩笑地引用典故说:“求之与?抑与之与?”此句出自《论语》,子禽问子贡道:“我们夫子每到一国,必预闻其国之政事,这是有心求到的呢?还是人家自愿给他的呢?”子贡说:“我们夫子是以温和、良善、恭庄、节制、谦让之心而得到。夫子之求,总该是异乎别人家的求法吧!”

陈寅恪引用此语的意思是,只要傅斯年能找到这些著作,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行。范文澜是著名历史学家,他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出版于1941年,林伯渠虽未有类似著作,但与延安学术界关系密切,故陈寅恪有此言。

据《同舟共进》刘克敌/文

李白、杜甫都是资深“京漂”

古代也有“京漂”,它的黄金时代要数大唐时期。当时,首都长安(今陕西西安)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,城内百业兴旺,最多时人口超百万,到京城寻求发展的自然是唐代青年的明智选择。因为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,唐代“京漂”以追求功名的读书人为主,大多以“进京赴考”的面目出现。

唐代“京漂”群体有多大,史料上未见记载,但从当时文人士子留下的诗中可推测出人数相当多,如李白、王维、杜甫这些著名的诗人,当年全都是“京漂”。

唐代“京漂”几乎没有人不拜朝中权贵或京城名人的,文人一般采取“行卷”的方式,通过献诗结识贵人。据说,李白“京漂”经历前后有两次,开元十八年(公元730年)夏,李白第一次来到首都长安,由于没有功名,他最先结识了名叫张卿的卫尉,并通过张卿得以向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献上《玉

真仙人词》,希望御妹帮忙。但李白并没能因此当上国家“公务员”,在长安白混了一年多。直到天宝元年(742年),已过不惑之年的李白二度“京漂”,才得以“供奉翰林”,却又不被重视,3年后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。

杜甫也是唐朝的资深“京漂”,《新唐书·杜甫传》称,杜甫“举进士不中第,困长安”,前后近10年。到天宝十四年(755年)才被授以“河西尉”的小官,却又不想干,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,其时杜甫已经44岁了。倒霉的是,当年年底爆发了“安史之乱”,刚有了一份固定工作的杜甫只好逃出京城。

唐代“京漂”如何解决住宿问题?城里住不了,他们一般就住在长安城南的终南山。终南山是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发祥地,也是当时“京漂”文人的聚居地,王维、李白、杜甫等都曾暂居于此,雅称“隐居”。

据《现代家庭报》朱秀兰/文

